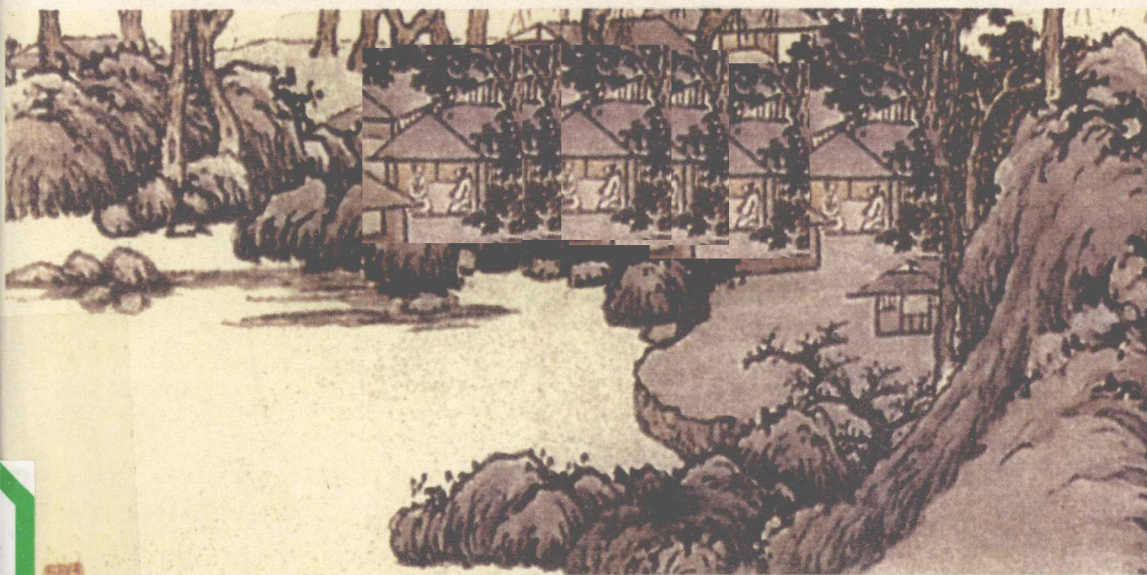


博雅英华 | 陈平原著作系列

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

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陈平原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博雅英华 | 陈平原著作系列

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

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陈平原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: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/陈平原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. 1

(博雅英华·陈平原著作系列)

ISBN 978-7-301-16427-3

I. 中… II. 陈… III. 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中国—现代
IV. B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7268 号

书 名: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著作责任者: 陈平原 著

责任编辑: 张凤珠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6427-3/I·2189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2

印 刷 者: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27.75 印张 394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2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3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fd@pup.pku.edu.cn

目 录

- 导 言 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/1
- 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/2
 - 二 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/9
 - 三 走向专门家之路/13
 - 四 章、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/20
- 第一章 求是与致用/23
- 一 “学在求是,不以致用”/24
 - 二 “殚精考索”与“兴起幽情”/38
 - 三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/49
- 第二章 官学与私学/59
- 一 “劝学”与“学隐”/60
 - 二 “学在民间”之自信/71
 - 三 书院讲学的魅力/82
 - 四 救学弊与扶微业/90
- 第三章 学术与政治/98
- 一 参政与回向/99
 - 二 保国或著书/107
 - 三 讲学复议政/118
- 第四章 专家与通人/131
- 一 古老命题的现代诠释/133
 - 二 “具有广博学识”的专家/137

- 三 “博学的人”与“国人导师”/144
- 四 从“开山斧”到“绣花针”/149
- 第五章 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/156**
 - 一 从“大胆假设”到“小心求证”/158
 - 二 双线文学观念/164
 - 三 历史演进法/174
 - 四 《红楼梦》自传说/182
 - 五 整理国故思潮/192
- 第六章 关于经学、子学方法之争/199**
 - 一 “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”/200
 - 二 《庄子》的挑战/202
 - 三 清儒之得失/206
 - 四 章、胡之戴震论/210
 - 五 对于“汉学”的推崇与超越/215
 - 六 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? /221
- 第七章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/227**
 - 一 游侠之“逍遥法外”/228
 - 二 “中国之武士道”/234
 - 三 对于流血的崇拜/240
 - 四 暗杀风潮之鼓吹/246
 - 五 联络会党的策略/252
 - 六 大小传统之沟通/258
- 附 录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——章太炎的学术品格/265**
- 第八章 现代中国的“魏晋风度”与“六朝散文”/273**
 - 一 被压抑的“文艺复兴”/275
 - 二 逐渐清晰的文学史图像/285
 - 三 师心使气与把酒赏菊/296
 - 四 乱世中的“思想通达”/309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五 | “谬种”与“妖孽”的不同命运/318 |
| 六 | 千年文脉之接续/327 |
| 第九章 | 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/336 |
| 一 | 学者为何自述/338 |
| 二 | 自传与自定年谱/345 |
| 三 | “我与我的世界”/352 |
| 四 | “诗与真”的抉择/358 |
| 五 | “忏悔录”之失落/364 |
| 六 | “朝花夕拾”与“师友杂忆”/371 |
| | 主要参考书目/379 |
| | 人名索引/392 |
| | 书名、篇名索引/405 |
| | 后 记/433 |

导言

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

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
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
走向专门家之路
章、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

倘若从事学术史研究,章太炎或许是最佳入口处。原因在于,“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”。正如侯外庐所说的,章氏对于周秦诸子、两汉经师、五朝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等,均有详细的论述,不难从其著作中整理出一部“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”^①;对于身处其间的晚清学界,章氏也有不少精彩的评说,只是不像梁启超那样形成专门的著述。其实,作为一代名篇的《清代学术概

^① 参见侯外庐《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》(人民出版社,1993年)第三章第八节。该书据生活书店1947年版《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》第三编改写,有关章太炎部分基本照旧。

论》，也只是梁氏拟想中的《中国学术史》之第五种^①。

晚清那代学者，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，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，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，希望借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来获得方向感。同样道理，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，重提“学术史研究”，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。因此，首先进入视野的，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“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”。

没有章、梁“从头说起”的魄力，自是深感惭愧；退而集中讨论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”，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。表面上只是接过章、梁的话题往下说，实则颇具自家面目。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，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，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，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。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，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。

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

自从余英时借用库恩(Thomas S. Kuhn)的科学革命理论，解释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^②，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。就像余先生所概括的，所谓“典范”或曰“范式”(Paradigm)的建立，有广狭两义，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的改变，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，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，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。依照库恩的思路，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：典范的建立—常态研究的展开—严重危机的出现—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，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。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维持“必

^① 参见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·第二自序》及其早年撰写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。

^② 参阅余英时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第19—21页，台北：联经出版公司，1984年。

要的张力”，乃是成熟的学者所必备的素质：可对于史家来说，最为关注的，很可能是危机已被意识、新范式即将浮现的“关键时刻”^①。依余先生之见，“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‘五四’前夕恰好碰到了‘革命’的关头”，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又恰好提供了“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系统”，故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典范的代表。^②此说有力地阐明了胡适的学术史地位，但并非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完整叙述。倘若辅以王国维、梁启超的思路，或许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一学术史上的“关键时刻”。

在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中，王国维以“国初之学大，乾嘉之学精，道咸以降之学新”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。此说常被论者引述，连带也被用来为王氏自家学术定位。其实，王国维并不认同龚自珍、魏源为代表的“道咸以降之学”，因“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，而其所以切今者，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，其言可以情感，而不能尽以理究”。就像他极为推许的沈曾植一样，王国维也是“其忧世之深，有过于龚、魏；而择术之慎，不后于戴、钱”。承继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，乃章、梁、沈、王等晚清学人的自我期待，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，便是：

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，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。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，其必由先生之道矣。^③

并非只是“旧学邃密”，更难得的是其“新知深沉”，晚清那代学人的贡献，实在不可低估。沈、王诸君，深刻意识到危机所在，走出“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，以图变革一切”的“道咸以降之学”，追求的正是新范式的建立。

^① 参阅库恩的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（李宝恒、纪树立译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0年）及《必要的张力》（纪树立等译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）第九章。

^② 余英时：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第84页。

^③ 王国维：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，《王国维遗书》第四册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。

可与王说相发明的,不妨举出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。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、全盛、蜕分、衰落四期,而衰落期中,必有豪杰之士崛起,其推旧与创新,即导入“第二思潮之启蒙期”。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,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,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、接引西方学术、回归经世之学,实际上将其视为“第二思潮之启蒙期”。如此自我定位,目光所及,在于“开来”,而不是“继往”。正如梁氏所称,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,在于“淆乱粗糙之中,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”^①。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,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,但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,足证其绝非只是“清学的殿军”。

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,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;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,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。在我看来,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,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。即便如此,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,仍能找到不少喜欢“从晚清说起”的知音。

认准“言近三百年学术者,必以长素为殿军”的钱穆,在其名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,为康有为专列一章。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,对康氏着墨甚少,因其认定“清末三四十年间,清代特产之考证学,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,而学界活力的中枢,已经移到‘外来思想之吸受’”^②这一思路,在其此前所撰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已有所体现,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,其贡献在于“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”^③。如此立说,表面上相当谦恭,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。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,康、梁、章、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。

经学史家周予同称康、章为今、古文经学的最后大师,并断言:“以后

① 参见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第一及二十三至三十三节。

② 朱维铮校注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第125页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85年。

③ 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第5页。

便没有大师了,作为经学,至此完结。”^①如此单独摘引,容易引起误解,似乎康、章只属于以经学为主流的清代学术。实际上,周氏相当重视康、章新见迭现的经学研究对于“新史学”的贡献。比如,将殷周以来的中国史学,分为萌芽、产生、发展、转变四期,而转变期则“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”——周氏此文撰于40年代,断言“新史学”的崛起“实开始于戊戌政变以后”,最初的动力来自康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^②。经学、史学如此,哲学也不例外。贺麟撰《五十年来来的中国哲学》,称“要叙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潮,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开始”^③。至于使得西方哲学“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”严复,也是康有为的同代人。文学革新方面,康有为影响甚微,但其弟子梁启超之提倡“文界革命”、“诗界革命”与“小说界革命”,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,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。

侯外庐40年代撰写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》时,将17世纪的启蒙思想、18世纪的汉学运动以及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作为整体叙述;五六十年代开始酝酿分而治之,80年代因注重“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”,方才明确从百日维新说起的论述策略^④。侯氏的思路颇有代表性:80年代中期以后,晚清社会及学界生气淋漓的新气象,日渐吸引研究者的目光,即便不喜欢“20世纪中国文化”这样的大题目,也都倾向于将康、梁、章、严、罗、王等从清学中分割出来。

不管是章太炎、梁启超,还是罗振玉、王国维,都喜欢谈论清学,尤其推崇清初大儒的忧世与乾嘉学术的精微。对于清学的叙述成为时尚,并非意味着复古,反而可能是意识到变革的历史契机。假如将蔡元培、钱玄

① 参见《中国经学史讲义》中编第八章,《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(增订本)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6年。

② 参见《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(增订本)第514页。

③ 贺麟:《五十年来来的中国哲学》第3页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89年。

④ 参阅侯外庐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》、《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》第一章,以及黄宣民为该书撰写的《后记》。

同、胡适、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学人对待清学的态度考虑在内,此一走向更能得到清晰的呈现。从宗旨、问题到方法,中国现代学术都将面目一新。之所以谈论清儒家法,很大程度是为了在继承中超越、在回顾中走出。即便主张保皇的前清遗老(如沈曾植、罗振玉等),学术上都颇具创新意识,绝非一句“清学的殿军”所能简单描述。晚清以降,不管是否曾经踏出国门,传统的变异与西学的冲击,均有目共睹。面对此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学界虽有“激进”与“保守”之分,但上下求索、为中国社会及学术闯出一条新路的心态,却是大同小异。

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,这点比较容易接受。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,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“共谋”,开创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。如此假设,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,这里先概述一二,具体的讨论请参见书中各章。

有幸“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诸论”的史家陈寅恪,对其时治经颇尚公羊春秋、治史喜谈西北史地的风气有深切的体会,强调其影响超越专门学问,而及于整个社会思潮:

后来今文公羊之学,递演为改制疑古,流风所被,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,浪漫之文学,殊有联系。^①

相信“学为政本”或主张学术能转移风气的先辈学者,多能领会此中难以实证的奥妙。比如,钱基博曾提及王闿运“喜为异说而不让,敢为高论而不顾”的说经,一转手而为廖平、康有为,再转手而为吴虞之“决弃一切”——后者已入“重新审查一切价值”的五四时代;钱穆则由晚清学风之“非怪诞,即狂放”,未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“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”,

^① 陈寅恪:《朱延丰突厥通考序》,《寒柳堂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。

论证何以辛亥革命后几十年,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走上正轨^①。或由经学转为文学,或从学风延及政治,二钱的论述,均不为现代学科设置所限。

“五四”一代学人,似乎更愿意在具体学问的承传上,讨论其与先贤的联系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《导言》部分,胡适高度评价章太炎用全副精力“发明诸子学”且能“融会贯通”,并称“《原名》、《明见》、《齐物论释》三篇,更为空前的著作”。顾颉刚1926年为《古史辨》第一册撰写长篇自序,突出康有为、章太炎的影响;晚年所作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?》,则强调“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”。类似的论述,如鲁迅怀念章太炎、郑振铎追忆梁启超以及钱玄同谈论康、梁、章、严、蔡、王等十二子的“国故研究之新运动”^②,均能显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勾连。

后世史家论及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历史联系,多兼及学业与精神。如余英时称“不但五四运动打破旧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,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、章诸人发展出来的”,以及王汎森讨论章太炎对于钱玄同、吴虞、鲁迅、胡适、傅斯年、顾颉刚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影响,均着眼于精神的承传^③;而恰好又是余、王师徒,格外关注胡适、顾颉刚对于史学革命的贡献。^④

不过,倘若由此得出结论,晚清、五四可以合二为一,则又非立说者的本意。周予同在高度评价康、章贡献的同时,不忘强调“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”,理由是,胡适“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

① 参阅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上编第一章第一节,长沙:岳麓书社,1986年;钱穆《国史新论》中的《中国知识分子》章,香港:作者自刊本,1975年再版。

② 参见鲁迅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(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)、郑振铎的《梁任公先生》(《小说月报》20卷2号,1929年2月)以及钱玄同的《刘申叔先生遗书序》(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)。

③ 余英时:《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》,《史学与传统》,台北:时报出版公司,1982年;王汎森:《章太炎的思想(一八六八—一九一九)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》第六章第五节,台北:时报出版公司,1985年。

④ 参阅余英时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以及王汎森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:一个思想史的分析》(台北:允晨出版公司,1987年)。

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,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,来涂饰它”,更能代表新范式的确立^①。此说是否过誉姑且不论,有一点是肯定的:胡适那一代学者,确实不为传统经学的家法与门户所限,对西学的汲取与借鉴,也比上一代人切实且从容。

事实上,五四那代学者,对上一代人的研究思路与具体结论,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就以常被论者提及的顾颉刚对康、章学说的借鉴而言,“顾氏对他们的学说都只取一部份,舍一部份,对康有为,舍的是尊孔的精神,取的是疑伪言论,对章太炎,取的是反孔精神,舍的是章氏对古文经的信仰”^②。而顾氏之所以有此胆识、有此创获,与清末今、古文经学激烈冲突,“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,使得观战的人消解了信从宗派的迷梦”有关;更离不开曾出入今古两家的钱玄同之指引以及胡适对“西洋的史学方法”的介绍^③。古史辨运动与晚清经学的联系脉络清晰,常被论者提及;至于哲学、文学的变革以及考古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建设,也都适合于戊戌生根、五四开花的论述思路。

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,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,这种论述策略,除了强调两代人的“共谋”外,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。相对来说,上限好定,下限则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,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,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,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,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^④。另一方面,随着舆论一律、党化教育的推行,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、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、旗帜

① 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(增订本)第542页。

② 王汎森: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:一个思想史的分析》第57页。

③ 参见顾颉刚的《〈古史辨〉第一册自序》和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?》,以及胡适的《古史讨论的读后感》、钱玄同的《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》等。

④ 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严复、刘师培、蔡元培、黄侃、吴梅、鲁迅、胡适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梁漱溟、欧阳竟无、马一浮、柳诒徵、陈垣、熊十力、郑振铎、俞平伯、钱穆等,或开始撰写或已经完成其代表作;汤用彤、冯友兰、金岳霖、张君勱等也已学成归来,并开始在大学传道授业。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(社会科学另当别论)的大学者,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,但毕竟数量不是太多。

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,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二 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

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、颠覆儒学中心、标举启蒙主义、提倡科学方法、学术分途发展、中西融会贯通等。构成如此纷纭复杂的图景,既取决于社会思潮的激荡、个人机遇及才情的发挥,也有赖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。三者兼而有之而且谁也逃避不了的严峻课题,则是如何协调“西潮”与“古学”之间的缝隙与张力。

晚清人眼中的“西潮”,一如其关于“古学”的言说一样五花八门。反过来说,每个人心目中的“西潮”,往往与其关于“古学”的定义密不可分。倘就具体学者而言,主张“西学东渐”的,与提倡“旧学新知”的,很可能势同水火;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来说,二者缺一不可。

相对来说,“西学东渐”来头更大,也更引人注目,即便心有疑虑者,也不便公开反对。尤其是从甲午惨败的反省,到五四运动的崛起,中国西化步伐之疾速,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在时贤眼中,“西学”就是“新知”,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,即在于传播并借鉴“西学”。起而抵御西化狂潮的,有极端保守派,但也有自认深知西学利弊,且对中国文化传统持有信心的,比如《国粹学报》诸君。

《国粹学报》第七期上有一宏文,再三论证“国粹也者,助欧化而愈彰,非敌欧化以自防,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”^①。如此曲为辩解,就因为其时的新学之士,已将“欧化”等同于“新知”。但实际上,《国粹学报》“痛吾国之不国,痛吾学之不学”的创刊宗旨,直接针对的,正是此“醉心欧化”的狂潮^②。不妨以主办人黄节、邓实的两篇文章为例。前者称:

① 许守微:《论国粹无阻于欧化》,《国粹学报》第七期,1905年8月。

② 黄节:《〈国粹学报〉叙》,《国粹学报》第一期,1905年2月。

“不自主其国，而奴隶于人之国，谓之国奴；不自主其学，而奴隶于人之学，谓之学奴”；后者则希望借表彰周秦诸子，“扬祖国之耿光”，进而实现“亚洲古学复兴”^①。依此思路，比起推动“西潮”来，复兴“古学”更能获得“新知”。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言，可聚集在其旗帜下的，除了邓、黄，还有章太炎、刘师培等一大批重要学者，实在不可等闲视之。

虽然也有“本报于泰西学术，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，皆从阐发”的表态，《国粹学报》依然“以发明国学、保存国粹为宗旨”^②。甲午战败后，时人普遍“观欧风而心醉，以儒冠为可溺”，提倡西学者理直气壮，反而是邓实等人的“摭怀旧之蓄念，发潜德之幽光”^③，显得有点不合时宜。可是，从晚清的《国粹学报》，到二三十年代的《学衡》、《制言》，再到90年代悄然升温的“国学热”，20世纪的中国，并非“西学东渐”一枝独秀。

1923年1月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创办《国学季刊》，提出“整理国故”的三大策略：“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”、“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”、“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”^④。这篇由胡适起草的“宣言”，强调“国故”与“国粹”的区别，除了“扩充国学的领域”，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意识。“输入学理”与“整理国故”并重，这本是“新思潮”的重要特征^⑤；可落实到具体语境，则往往各执一词，互相攻讦。不少新文化人出于对“复古派”的高度警惕，很难认同“整理国故”思潮。像陈独秀那样破口大骂的固然不多，但忧心忡忡者不少^⑥。实际上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人，即便日后从事国学

① 黄节：《〈国粹学报〉叙》；邓实：《古学复兴论》，《国粹学报》第九期，1905年10月。

② 参见《国粹学报》第一期上的《〈国粹学报〉略例》。

③ 邓实：《国学保存会小集叙》，《国粹学报》第一期。

④ 胡适：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，《胡适文存二集》，上海：亚东图书馆，1924年。

⑤ 胡适：《新思潮的意义》，《胡适文存》一集，上海：亚东图书馆，1921年。

⑥ 参阅陈独秀《国学》（《陈独秀文章选编》中册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4年）、鲁迅《所谓“国学”》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）、郭沫若：《整理国故的评价》（《创造周报》第36号，1924年1月）和茅盾：《进一步退两步》（《茅盾全集》第十八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9年）。

研究,也都很少完全拒斥西学,成为真正的“国粹派”。

同样“整理国故”,《国粹学报》与《国学季刊》的论述策略颇有差异。对前人的思想学说,到底是突出批判意识,还是强调“具了解之同情”,取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。作为西化的代表人物,胡适为了缓和同人的不满,强调自己钻进“烂纸堆”,是为了“捉妖”“打鬼”。将“整理国故”的目的简化为“化神奇为臭腐,化玄妙为平常”^①,这与其极力划清界限的“爱国主义史学”,同样属于“主题先行”。某种意义上,这正是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尴尬之处: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,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。至于具体论述中,倾向于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,更是很难完全避开的陷阱。即便如此,本世纪的中国学界,仍以“疑古”而不是“信古”为主流^②。

在国学与西学、信古与疑古、抵御西学与批判复古截然对立的论述框架中,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对方的合理之处。于是,兼采东学西学、超越非此即彼的言说,成为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最大愿望。王国维“学无新旧,无中西,无有用无用”之说^③,虽系至理名言,却有些悬的过高;不若陈寅恪“对于古人之学说,应具了解之同情,方可下笔”,以及钱穆“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”的说法^④,有其直接的针对性。撇开本世纪中国学界以反叛传统、表彰异端为主流,便无法理解陈、钱立说时深切的忧患。在社会思潮中,确有盲目复古的“爱国的自大狂”;可在学术界,最大的弊端,还是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。

① 胡适:《整理国故与“打鬼”》,《现代评论》第5卷119期,1927年3月。

② 自从冯友兰在《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》、《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》等文中,借黑格尔的“正、反、合之辩证法”,将当代中国史学划分为信古、疑古、释古三派,时人纷纷对号入座。当事人顾颉刚晚年在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?》中提出异议,理由是“疑古”本身不能自成一派,因其有所“信”,方能有所“疑”。在我看来,如此代表辩证法三阶段的三派说,大可怀疑;一定要区分,也只是“释古”时之倾向于“信”或“疑”。

③ 王国维:《国学丛刊序》,《王国维遗书》第四册。

④ 参阅陈寅恪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(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)和钱穆《国史大纲》第1页(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74年)。